

未刊文献中所见之容闳

吴义雄

[提要] 多年来,研究容闳的直接史料,主要是其自传,而美国耶鲁大学所藏“容闳文献”及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所藏1902年“容闳日记”等资料,则未得到很好的利用。这些第一手史料,展示了容闳一生中的重要片段。容闳早年的书信,他在毕业之际与同学间相互赠送的留言,显露了他在美国求学期间的经历和心态。透过他写给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的长信,可以知晓他为中国幼童留美事业进行的筹划。而他与美国汉学家卫三畏之间的通信,则表明了他在解决美国华工问题上的努力。容闳1902年的日记,记录了他在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点滴,以及他与保皇会、革命党等各方人士交游的细节。除本文所论外,更多海外所藏容闳文献尚待进一步发掘和利用。

[关键词] 容闳文献 容闳日记 耶鲁大学 留美幼童 卫三畏

[中图分类号] K825.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4)05-0121-12

容闳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与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他80多年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历史。学术文化界和一般读书界对他持续不断的关注,证明了他作为近代史上第一流人物的地位。然而,与晚清时期立于历史潮头的其他人物不同,容闳身后留下的文献资料不多。容闳研究者经常征引的主要材料,是他晚年完成的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更有味道、也更经典的书名翻译是《西学东渐记》)。多年来,研究者尽力从各种文献中挖掘相关史料,不过总体上来说仍然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现在存世的与容闳直接相关的一些原始文献,却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早在1965年,已有学者在关于容闳的论文中运用了耶鲁所藏的容闳致卫三畏的亲笔函件和美国康涅狄格州档案馆所藏的容闳日记。^①20多年前,章开沅先生在耶鲁大学接触到该校所藏包括函件在内的容闳文献。章先生在1998年珠海召开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的学术报告,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章先生后来还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介绍和论述。^②有的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引用过藏在康涅狄格州档案馆的容闳日记。^③但总的来说,这两种珍贵的原始文献,迄今并未得到大

部分研究者的重视和运用。

笔者近年在容闳故乡珠海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从耶鲁大学购回该校所藏容闳文献的缩微胶卷，并获得了1902年容闳日记的复制件。现在，正与合作者一起，对这些文献进行翻译、整理和研究，不久之后会交付出版。本文尝试运用这些材料，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容闳生命中的几个片段，作进一步的展现和阐释。

一、求学时代的容闳

耶鲁所藏容闳文献中数量较多的是他写给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信。卫三畏原是美国公理会派往中国的印刷工，在广州和澳门生活多年，对中国社会及历史文化都很熟悉，后为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以《中国总论》等多部著作享誉西方学术界。他亦曾在美国驻华使团任职。章开沅先生在他的《先驱者的足迹》一文中，曾对这些信件的内容做了很好的介绍。^④这里结合笔者的理解，就相关问题再作一些阐述。

容闳给他的第一封信写于1849年4月15日，其时，他在美国“能再待多久尚在未定之数”。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赴美后求学的状况，谈到他学习英文的经历，还提到他开始学习拉丁文以为升入大学做准备。为此，他请求卫三畏给他帮助，首先是请后者雇佣他的哥哥容阿林（Yung Alum），其次是请求卫三畏和他的叔叔容名彰（Yung Ming Cheong）商谈他继续留在美国的事。他告诉卫三畏，“我很想在这里受大学教育，而且可能性很大”。^⑤这虽然是他到美国后就产生的一个心愿，但与其家人对他在美留学期限的预期不一致。因为他曾向家人许诺“出国两三年就回家”。他写道“所以我请您和我叔叔探讨，尽您所能劝服他接受我在这个国家多留6年的目标，以及我在这里受教育将会得到的结果”，即大学教育和学到更多知识对他将来生活的影响。“您同他谈过后，他会找机会和我母亲说。如果您雇了我哥哥，我留在这里的障碍就微乎其微了”，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推迟回国，无须马上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他解释说，他之所以请求卫三畏去做这件劝说家人的事，“是因为您的中文比其他（外国）人更好，同时，他们对您也比对其他任何人都相信”。^⑥他还要求卫三畏在有空时，向当时为卫氏工作的一位表兄弟阿申（Ashon），说明他信上帝和学习科学知识“是多么好的事情”，因为他的母亲很相信阿申的话。他写道“他们不希望我留在这里的首要原因，是惟恐我拥抱这个新的宗教”；还怕他在美国结婚“并滞留终生”；当然“还希望我回家挣钱”。^⑦这表明，容闳此时很可能已经加入基督教会。^⑧以上所述也说明，容闳在两年期满后留在美国继续求学，其困难不仅来自于原有经济来源的断绝，还来自于等待他挑起养家担子的家庭。

容闳的忧虑并不止于这些实际的因素，他还担心观念上的原因会使家人或其他人士难以理解他的行为。他在这封信里还说“您很了解中国人的偏见，知道他们如何曲解事物，他们无法像您和其他有知识的人那样，理解教育的目标、优长及其价值，无知和迷信封闭了他们的大部分心灵，他们如何能够理解事物的真正价值！”^⑨他的这段话是针对其家人或其他人士可能无法理解他为何需要在美国留学如此之久的境况而说的，是为了解释请求卫三畏为他滞留美国之事向他的叔父说项为何是必要的。这段话显示了容闳对当时中国人缺乏对于近代教育的了解的无奈之情，也表明他在受西式教育近10年，又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更直接、更完整地体会这种教育之后，对于西式教育价值之肯定。容闳决定留在美国继续求学，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接受优质、美好的教育，而在思想上与其家人和当时对西人教育略有所知的其他中国人有了相当的距离，绝不满足

于用他已经学到的流利的英文回国谋一份通事之类的差事。青年容闳对于近代西方教育的肯定和对于国人教育观念的否定，预示了20多年后他对海外留学运动的大力倡导。

将与自己命运相关的事情托付给卫三畏，说明容闳对卫氏非常信任，也说明他和卫氏之间有着比较深厚的友谊。他在1850年圣诞节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卫三畏。其时，他已经如愿考入耶鲁大学。他对过去一年没有回复卫三畏的两封信表示歉意，原因是他“一直在为考大学而作准备”，“所以写信比以往少得多”。^⑩他报告说，他已经成功地考入耶鲁大学，而且也完成了一个学期的学习任务。他在信中谈到了对新鲜的大学生活的感受，谈到学业的繁重；他承认，由于他准备的时间不够充分，与其他经过长时间预备的同学相比，基础不够厚实，学习有些吃力。^⑪

这封信的几个段落，可以让我们了解容闳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位一心在远隔重洋的异国求学的青年，心中始终记挂着他的母亲，他的家人。他向卫三畏倾诉“我的思亲之情甚于一切”，他从母亲的来信中得知兄长去世的消息，“难过了整整两个星期，放弃了上大学的所有期望，尽管当时我正在全力以赴”，请求卫三畏“告诉我整个事情的真相，以使我从巨大的焦虑中解脱”。他表示，“我有时想放弃我的决心，带着我已经学到的知识回去，以便改善我的母亲和其他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境况”，“没有什么比他们更让我思念的了”。一位游子的愁肠跃然纸上。然而，容闳毕竟是有着坚强信念的人，他的理智最终战胜了伤感，使他决定坚持完成学业。^⑫一年后，容闳将自己通过打工挣得的30元钱托人带给卫三畏，请他将其中的25元转交给他的母亲，“如果她还活着的话”。他的确不知她的生死，因为已有一整年未得到她的音讯。如果母亲不幸已经去世，他请卫氏帮忙分给他的弟弟或妹妹。^⑬

剩下的5元钱里，有4.5元是用来支付卫三畏帮他购买书籍的钱。读过容闳自传的人都会注意到，他在1854年回国后，对自己的母语竟然既不会说也不会写。他在1850年的信里描述了他当时的生活状态，使我们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这种情形。他写道“我倍感孤独，无人与我用中文谈话。我的中文写作能力快速丧失”；“在我离开中国时，我没有带任何中文书”。没有同胞与他交流，以前在马礼逊学校的同学，包括和他一起到美国、后到英国的同学黄胜，都没有给他写信。^⑭可以想见，容闳当年面对的是多么大的语言、文化上的孤独。他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尽力维持与母语之间的联系，所以一年后请卫三畏代购中文书寄给他，还在信的附言中要求卫三畏帮他购买波乃耶（Dyer Ball）所编写的中英文对照年历，“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中国的日期”。他还说“由于我的中文知识有限，请您在寄给我之前为这些书做些断句”。^⑮这些话都很清楚地表明了，出国前只受过有限的中文教育的容闳，在当时那种完全脱离了祖国的文化环境、也没有机会接触到任何同胞的情况下，两三年间就几乎丢掉了原来的语言，而他为了维系与祖国间的文化联系，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行了努力。

到1852年底的时候，容闳已经度过了大学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他在耶鲁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非专业化的训练，故他开始考虑将来的职业问题。他在给卫三畏的信中写道“我将在1854年夏得到文学士学位（B. A.），之后我将回家，学习我未来的职业。关于职业，我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想法。不过有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会学习农业化学。我也许还会学习内、外科医学。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学，每一门都对造福国家大有价值，这真令人兴奋。”^⑯他在信的末尾还提到，他在纽黑文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夫妇。他和裨治文商量将化学引进中国之事。可见，容闳希望他将来的职业是要对中国有益、并具有实际用途的。他认为他个人的判断和兴趣在其职业选择中都不重要，“我希望在上帝的指引下能够

做出满意的选择”。^⑭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要在回国后根据实际情况或机遇再做决定。

现在所存容闳归国前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853年7月27日，也是写给卫三畏的。他在信中询问卫三畏是否收到他前一年底所寄的30元，重复说明他请香港《德臣报》(The China Mail 或译《中国邮报》)的编者、他当年赴美的赞助人安德鲁·肖特里德(Andrew Shortride)转交给卫三畏的信中所交待的这些钱的用途。他特别提到不知母亲是否健在，担心她已经辞世，请卫三畏告诉他实在情形。他在信中表示，完成学业后立即归国，“我希望从现在起一年后能见到你，如果我还能活着的话”。^⑮他在信中还提到了太平天国，要求卫三畏在回信中告诉他“关于这场革命的事，因为对他所有的活动都深感兴趣”。对太平天国的这种兴趣，也许是他后来探访天京的一个早期导因。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对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表示关心“传教士们怎么样？裨治文博士翻译《圣经》的事进行得如何？您的身体怎么样？”^⑯

以上所述的容闳函件，当然还是不完整的。但从这些函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早期的精神世界。他孤独地坚持完成了七年的异国学习生涯，付出长期离别亲人的代价，但也获得丰厚的回报。异国的优质教育使他形成了领先于他人的历史性眼光、诚实的品性、坚强的意志和信念等。但他也有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人那种平凡的情怀。他在信中倾诉的孤独、惆怅和强烈的思乡之情，向后人呈现了他丰富的情感和常人所有的脆弱的一面。这样的容闳才是真实的。

二、容闳与留美幼童教育的筹划

青年容闳的经历有助于历史学家描述“最早的留美学生”的形象。容闳另一个大放异彩、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人生阶段，是他开创并管理120名中国幼童留美事业的时期。耶鲁所藏的容闳文献，自1853年夏容闳致卫三畏的信之后，时间上中断了20多年。在这封信之后的，是1870年代容闳管理幼童留学时期的一些函件。

派遣幼童留美，是晚清教育史上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容闳为此筹谋策划多年。他虽然位卑言轻，却是这一计划实际上的发起人、推动者和执行者。1872年2月，在出洋肄业局的筹备和招生工作大致就绪之际，容闳给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的诺亚·波特(Noah Porter)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清政府的这一留学计划。这封信内容丰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幼童出洋留学计划。

该信的第一段写道“我极为愉快地通知您，1871年10月1日，中国政府未让我们再次等待，批准了派遣本国青年到合众国接受完全的教育，以便将来在各方面为中国公众服务的计划”。^⑰容闳自传中关于清政府批准派遣幼童留学计划时间的说法是“一八七〇年冬，曾文正办天津教案事毕，回任两江，抵南京后，奉到前所上封奏朱批着照所请。”^⑱对时间的表达比较笼统。而这封信中则明确说是10月1日。由于这是在事情进行过程中所作的叙述，而非多年后的回忆，所以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

接下来他对整个计划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段文字与容闳自传所述在细节上有些不同，这里可作一些对比。

容闳自传：旋决定学生人数，照予前次所拟，暂定为百二十人。学生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其曾入学校已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应考及格后，当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当未出洋之先，学生之父

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此规定学额及招考章程之大略也。^②

容闳致波特校长：此计划的主要内容略如下述：在上海建立一个预备学校，从各地招来的学生在此接受录取考试。录取要求包括具有学习能力，体格强健，品行端正，身家殷实，年龄在十到二十岁。要求他们学过一些（中国）经典，年龄在十五至二十之间者须能按中国固定格式作文一篇。预备学校将教授英文和中文，每天时间平均分配……

尽管每年只招三十人，但招考常年进行。现在的计划只打算每年派遣三十人，连续四年派遣，故总数为一百二十人。但不是说这一百二十人都要派出去，可能也会中途停止。计划的持续端赖于第一批三十人学习的情况，以及他们最终学到的东西。也有可能在两三年后，有些人会被派到英国，有些也许会被派到普鲁士接受教育。^③

显然，容闳在自传中所说的计划与他给波特的信中所说的有几点明显的不同。除了关于学生年龄的表述不同外，致波特信中关于派遣方式的表述更详细一些。特别是关于派遣学生赴英国和普鲁士的计划，是包括其自传在内的其他材料所未提及的。

信中提到的规定还有“他们不得成为美国公民，不得永久居留，也不得为了牟取个人钱财而中辍学业。由于他们是由政府资助留学的，须承担西点军校或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学生对美国政府所承担的类似责任。”^④

容闳在信中谈到了当时准备工作的进展，告知首批幼童将乘6月的汽船前往美国。他也提到对幼童进行管理的出洋肄业局的组成以及译员和中文教师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容闳写道：“除非官方提前召回，他们将驻在美国直到幼童完成学业。整个学习期限为十五年，若全部或部分学童能提前完成其专业课程，则并无禁止其返乡之规定。”^⑤最后这句话显示，已在中国官场历练数年的容闳，一开始就知道幼童留学存在被官方“提前召回”的可能性。

这封信又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关于幼童留学目的的说明“中国政府最希望（幼童）学习的专业是陆军、海军、医学、法律和土木工程。在科学方面，他们应深入学习化学、自然哲学（物理学）、地质学和天文学的知识。”^⑥很明显，清政府一开始就希望将这些学生将来优先使用于军事、外交等方面。故当数年后容闳报告美国国务院拒绝中国学生进入军事院校时，李鸿章的回信令容闳感到“留学事务所前途之无望矣”。^⑦即是说，李鸿章可能将中国学生能否进入美国军事院校与是否维持留美学生事务直接关联起来了。容闳自传对李鸿章的决策颇多怨言。但他1872年写的这段话表明，派遣幼童到美国学习军事是清政府的首要目的，并非李鸿章个人的一时主张，或是出于对美国违背《蒲安臣条约》的愤慨；而在此目的失败后即中途取消已经实施多年的计划，的确显得鲁莽轻率，缺乏高远的见识；但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结果意味着当年派遣幼童赴美一个主要目的遭受挫折，维持这项事务的一个重要理由也就不复存在，在吴嘉善等极为负面的报告和奏折的共同作用下，做出撤回留美学生的决定，自有其必然的逻辑，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有害决定。

容闳在上海给波特写信的主要目的，是请他和耶鲁的其他教授一起，为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教育进行筹划，以便他先期抵达美国后得到他们的建议。容闳请他们一起考虑“适合于将他们培养成最为有用的人才的最佳教育模式”。他介绍了这些幼童的基本情况，作为供这些教育家考虑的材料。他请波特等人根据这些情况“拟订一个明确的课程表”。容闳对这些幼童的介绍表明了

他对这些人的基本看法，也是颇具参考价值的。^②他要求这些教授在制订教育计划时考虑以下情况：他征询意见，希望了解：既然住在城里费用较高，故如将他们送到费用较低的乡村生活，“是否诱惑较少而风俗朴实，较之城市更有利于学生良好习惯及大丈夫性格之养成”？是否应将他们分散到许多学校以便他们能较快地学习英语？是应将他们送进寄宿学校，还是应为他们寻找寄宿家庭？是一开始就将他们分散到各地，还是先让他们在一起住上半年，再让他们分开？显然，容闳提出这些问题，说明他虽请求波特等人制订教学计划，但他自己实际上也为培养幼童的模式进行过具体的思考，在细节上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三、容闳、卫三畏与美国华工问题

卫三畏从中国回美国后，被耶鲁大学聘请为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使得容闳与他之间的联系重新密切起来。有5封容闳在1870年代后期致卫三畏的信被保存了下来。不过，他的这几封信谈的主题不是留美幼童的教育，而是美国西部沿海地区及华盛顿政客的排华问题。容闳自传中叙述了他在1874年前后受清政府之命前往秘鲁调查华工受迫害之事。在这之后，他还在美国进行了一些活动，其自传中却没有提及。因此，他的这几封信就成为可以弥补原有记载空缺的宝贵资料。

1877年2月19日容闳致卫三畏的回信，是现在可以看到的1853年后容闳写给卫三畏的第一封信。容闳表示将到纽黑文去拜访卫氏。随后，这封信谈到《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登载了14日容闳等人拜会康涅狄格州议会的消息，表示他会寄一份给卫三畏，但怀疑该报所载是否能比纽黑文的报纸更详细。这封信的以下文字表明了容闳所谈的事件性质“恭亲王和总理衙门无疑会对我们受到的善意接待感到高兴，而且我很肯定，当他们比较不同的立法机构之行为时，中国人在太平洋沿岸所受到某个特定阶层的美国人残酷的、几乎是野蛮的对待，会使他们心中发生一种生动的对比。”^③这些话透露的信息是，在调查秘鲁华工的状况后，容闳继续为改善美洲华工的处境而努力。他之所以与卫三畏谈论此事，是因为长期在中国活动的卫三畏，也是为华工辩护的人物。“作为这个苦难和被诬陷的民族的代表，卫三畏最有力的杰作是一篇关于‘中国移民’的论文，1879年该文在萨拉托加的社会科学学会上宣读，后来由斯克雷伯勒兄弟公司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④不过卫三畏的努力并非从1879年开始，容闳的信件告诉我们，卫氏从回美国后就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实际上代表了有良知的美国人的意见。卫三畏除了在公共媒介上发表有一定影响力的文章外，还进行了一些实际的游说工作。容闳的后一封信提到，卫三畏给美国政要西华德（Mr. Seward）写信，并且向排华运动最烈的加州调查委员会致函。^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在中国度过数十年光阴的美国人，可以看作一位“中国之友”。^⑥

容闳在第二封信中也谈论了他的康州议会之行，告诉卫三畏《哈特福德周报》刊登了关于这次会见的完整叙述。这封信还谈到，他没有兴趣在华盛顿租房，尽管他此时已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副使。这说明他的心思所系是留学事务。信中还谈到西班牙就其船只在台湾发生的船难与清政府的交涉，并向清廷索赔。容闳愤慨地写道“中国应当就西班牙人在古巴对三、四十万华人的奴役，并为在种植园监工的蹂躏下死亡的中国人，索取完全的赔偿。”^⑦

美国政府的排华议案引起有识之士持续的抗争，容闳也密切注视着事情的进展。卫三畏曾提醒容闳主意美国国会华工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容闳在另一封回信中告知他已经获取这份报告，并“怀有浓厚兴趣”地读到卫氏在一份“外交通信”中发表的文字。他还对美国几位“政

客”的言论进行了谴责，认为他们的言论“对有思想的公众”不会带来有益的启发，“尽管无法否认他们真的对某些群氓具有影响力”。同时，他也对一些有正义感的政治家表示赞美。^③

容闳在以往留学时代，以及随后的一些岁月里，接受过著名的、在历史上坚决反对鸦片贸易的奥立芬公司（Misers Olyphant & Co.）的帮助。但看来这个公司后来参与了向秘鲁运送中国苦力的勾当。容闳在信中用比较长的篇幅表达他的失望。他向卫三畏了解“奥立芬公司充当向秘鲁输送中国苦力的代理商一事是否属实”，认为“即使所获条件再好，这也是一项令人厌恶的生意。我无法想象奥立芬公司会允许他们的美名被这只能带来憎恶和堕落的贸易所玷污”。^④一年之后，在另一封致卫三畏的信件中，容闳再次对此表示遗憾之情，说“我只能认为他们为秘鲁政府充当输出中国劳工代理之事败坏了他们的声望和令誉”，并说驻美公使陈兰彬也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⑤容闳在华工问题上表达的正义感和民族立场，是很明显的。

四、容闳之交游

容闳从进入教会学校之日起，就开始结识各方人士，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活跃于中美两国的历史舞台，涉足于学、商、政各界，交游极为广阔。可以说，观察以他为中心的各种交往，可以窥见晚清史演变的基本过程。本文所论容闳文献依然有限，但或许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些有趣的片段和线索。

给了容闳最优质教育的耶鲁大学，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容闳在离开耶鲁后展开的精彩的人生历程，本身已是对耶鲁最好的回报。但这位既没有金钱、也没有显要地位，却很著名的耶鲁学子，也想对母校做点实际的贡献。他在1878年向耶鲁捐献了40种1237卷中国书籍，包括《纲鉴易知录》、《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三国志》、《康熙字典》、《李青莲诗》等。为此，他和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范内姆（Addison Van Name）教授多次书信往还。^⑥从这些函件来看，这是容闳从国内运到美国的一批书中的大部分。他在3月1日的函件中说，“我留了一点做参考”，“那套历朝正史属于出洋肄业局。如果我还有一套的话一定会送给（耶鲁）大学”。^⑦函件还显示，容闳选择此时向耶鲁赠书与卫三畏也有一定关系。容闳在就此与耶鲁方面联系的过程中，提出他捐献这些图书的惟一前提，就是耶鲁须先设立汉学教授讲席，并一再在他给范内姆的信中强调这一点。他在3月1日的函件中说“一旦我收到设立中文教授的通知，我就会将书寄出”；还说，“卫三畏博士将会就书目中的中汉字问题给您出主意”。^⑧卫三畏大约在这个时间被耶鲁聘为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可见，他希望这次捐献也能够推动耶鲁教育发展和加强中美交流。其后，容闳还表示为耶鲁写信回国购买历朝正史、《大清律例》、《大清一统志》等图书。其中，《大清律例》在1879年寄到耶鲁图书馆。^⑨

耶鲁所藏“容闳文献”中保存的最早的一封信件，是1848年6月容闳写给托马斯·盖劳德特（Thomas. H. Gallaudet）牧师的。托马斯·盖劳德特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又进入波士顿的安多佛神学院学习过，后来则成为美国著名的聋人教育家，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开办了北美第一间聋人学校，成为聋人教育的先驱。他虽然主要从事教育，但显然还保持着圣公会牧师的身份。从这封信来看，刚到美国不久的容闳在1847年冬季就和他的家庭之间有较多往来。^⑩这是一封因爽约而道歉的信。容闳曾表示，他在1848年暑假的某个时候将拜访盖劳德特夫妇，但由于在他求学于马礼逊学校时期的老师、带他和黄宽、黄胜到美国的鲍留云（Samuel Brown）的家里耽搁太久，而他当时就读的孟松学校开学在即，无法践约，故特致函说明。这封信中有一句话值

得注意 “我会在离开这个国家前往他处之前，设法找时间到哈特福德拜访您”。⁴²根据容闳自传，容闳等三位中国学生的赞助人支持他们游学美国只到1849年底为止。故容闳说 “在孟松之第一年，予未敢冀入大学”。⁴³这封信可以证明，晚年的容闳对他当时境况的回忆还是准确的。

从容闳早年这封信来看，这位求学于异国的青年虽然英文还不够好，品德上则坦诚而有礼。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异国的文化环境中比较深入地融入当地社会。文献显示，容闳与盖劳德特家族结下了长期的友谊。1848年，托马斯·盖劳德特作了一首题为“致耶稣”的诗送给他。容闳将这首诗珍藏了数十年。到1911年，托马斯的儿子爱德华·盖劳德特（Edward M. Gallaudet）又从容闳处将此诗抄回，此时容闳已是83岁高龄的老翁。容闳与这个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美国家庭保持了终生的交往。⁴⁴同样，容闳与当年带他到美国的鲍留云及其家庭，也保持了长期的、密切的联系。⁴⁵

耶鲁所藏容闳文献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该校1854届的毕业纪念册。这一纪念册原属容闳，经过有心人珍藏而保留了下来，里面记录了他的同学给他的毕业赠言。现存的几十则同学赠言或长或短，但都表达了美国同学对这位来自遥远的东方的同窗的情谊和祝福。章开沅先生的文章已经介绍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这里再摘录一些。一位叫做亨利·鲍德温（Henry Baldwin）的同学写道 “我知道您将来无论做什么，都一定会成就非凡。如果我能访问中国，我一定努力找到您”。⁴⁶查尔斯·巴瑞特（Charles Barrett）则说 “很乐意在这一页纸上写下对你的爱心和勤勉的赞誉。我愿意永远把你当做亲近和珍爱的朋友。我们分开后请想着我。真诚希望你的所有努力都会获得丰厚的回报”⁴⁷有人展望未来，说 “让我们做个交易——您要我的药，我要您的茶。这很公平，不是吗？”还祝福容闳未来成为 “为女人所爱、为男人所敬”的 “天朝共和国总统”。⁴⁸詹姆斯·巴蒂赫卢斯（James T. Batiherus）看来从孟松学校时期就是容闳的同学，所以他在赠言中写道 “我们作为学习上的同伴，度过了漫长的6年，在这期间，我们的友谊因为相互热爱和温情而牢固”。⁴⁹

容闳的品德和为人不仅为他赢得了众多的朋友，也使这些对中国所知甚少的美国青年因为他而对遥远的东方国度产生良好的印象。一位叫做威廉·考其索（William Kautchisow）的学友写道：

我清楚地记得，我曾认为能做一个中国人是件激动人心的事。现在我相信我有一个中国好朋友……我会一直怀着愉快的记忆想到你。无需提起你的才华，因为更好的评判者已经多次予以褒奖。你的君子之风使我获益匪浅。作为同学和图书馆员，我们曾很接近。我们一同工作的许多美好场景将会浮现在记忆的画面中。⁵⁰

有些同学给容闳的赠言则比较长。如卡廷（T. W. Cattin）的赠言表达了对容闳依依惜别之情 “我相信我和您在（耶鲁）大学的相识，是您回到地球的另一边您的故土之后值得回忆之事。我向您保证，我将永不忘记我的中国同学，他的热心肠和他对我们的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他为他的中国，为了她的最高利益而奉献的愿望，令我深爱，并深感趣味”。⁵¹随后，他还写了一长段话，回顾他和容闳在耶鲁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从中也可了解了容闳在耶鲁的生活和思想的细节，他强调二人之间 “那么多的交往和温情使我们的大学生活如此地令人愉快”，提到他们作为划船俱乐部成员的友情，提到一起漫步林间和街市的愉快经历。他特别提及容闳向他诉说的对祖国的情感和抱负，表示他 “将期待和希望听到您在未来中国历史上创下的大业——我真的希望您为了她所立的大计划终会实现，而您将在您的同胞的生活中成为一位伟大、优良和有用之

人”。^②

卡廷并不是惟一个提到容闳的“大计划”的同学，如另一位同学哈伯尔（Henry L. Hubbell）写道：

在你“劳作并等待”那热切的努力带来嘉惠同胞的变革之时，让这份情感使你快乐。在你奋斗的时候请记住在美国的许多朋友。他们热烈的同情心与你同在，他们也为你将要投入的服务人类的工作而祈祷。在曾栖身于教堂的朋友当中，我会永远愉快回忆我们的交往，因为发生过会使我忆起你的事。亲爱的伙伴，现在离别在即，让我祝福你发挥潜能，结交一大群朋友，名列世界优秀人物榜。^③

这些充满情感的话语，也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容闳在耶鲁生活的简单素描，让我们了解到他在异国求学时对自己的祖国怀有的深情，以及他在大学时代为了未来改造中国而立下的雄心壮志。从他人的笔下写出的这些话，如容闳的自传一样，体现了他的思想和情操。这些同学所说的“大计划”，是否就是后来他筹划和推动的中国学生海外留学计划？这一点颇能令人产生遐想。我相信后者至少是他的“大计划”的一个部分。容闳在自传中屡次提及，推动中国青年的海外留学事业，是他长久以来的计划。其他同学给他的题辞中，也有不少人祝他实现报效祖国的计划和抱负。可见，容闳在耶鲁求学的几年中，一定时常向同学讲述他的这种志向。

容闳给同学的赠言，在他的同学看来，一定有着很难得的东方情调。他给一些同学的赠言中，包含了用中文所写的格言，同时附有英译。他在这些赠言中所写的格言有“人为万物之灵”；“礼之用，和为贵”；“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有志者，事竟成”；“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等等。他给同学的赠言，现在留下的不多。章开沅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曾予介绍，可参见。^④

由于容闳与耶鲁同学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情谊，他在1864年借奉曾国藩之命赴美采购机器之机会，愉快地参加了毕业十周年同学聚会。“旧雨重逢，一堂聚话，人人兴高采烈，欢乐异常。虽自毕业分袂后，十载于兹，而诸同学之感情，仍不减当年亲密”。^⑤他在自传中专门记载此事，表明他对这种经历的珍惜。

现在保存在康涅狄格州图书馆的容闳1902年日记（*Diary of Yung Wing, 1902*），则留下了他晚年社会交往的一些记录。他的日记比较连贯，自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02年1月1日）到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11月29日），共11个月、300多天，除少数日期有失记的情形，绝大部分日期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容闳在日记本用阳历印好日期的后面，用阿拉伯数字标上阴历日期，每天如此，回美国后也保持这个习惯，显示了他的严谨风格。

与他的上述书信不同，容闳这一年的日记基本上是对每天日常事务的简短记载，我们无法从中了解他的活动和思想的详细情形。如第一天（1902年1月1日）的日记：

昨日自香港返回。

起草还款保证书供杨兰臣签字。自1901年6月起他不时向我借款，共欠5770元。

利息7%。

向逸卿（Yung Yat Hing）预付两个男孩食宿费20元。

其中提到的杨兰臣欠款之事，在此后数月成为日记的一项经常提及的话题；容逸卿是容闳的侄子，在他居澳门和家乡期间为他打理事务。上述文字就是容闳当年日记的典型面貌，其他日期的内容有的多些，有的更少。但即使内容较多之时，文字也极简略。不过，这些简短的记载也可

以显示从其他史料中难以得到的信息，显示容闳的生活状态、他的行踪、他所处理的事务，偶尔也针对特定的人和事物吐露他的情感。这一年的日记提供了上半年容闳在香港、澳门一带居住和活动的资料，下半年他返回美国途中的见闻，以及他定居哈特福德后的记录。例如，日记中记录较多的是他和其他人的经济来往，他与家人、亲朋故旧之间的往来，他的健康状况，等等，而大家熟知的文献里却很少这样关于容闳个人生活状况的资料。这些，虽然与国家大事无甚关系，但却展示了这位七旬老人的生活细节。如5月8日的日记记录“试图购买船票，但又没买到。最后前往太古邮轮公司，得到‘伽力克号’（Garlic）的一张船票，价格45镑——536.65元，据公布15日开行。”^⑧次日的日记记录他前往太古公司支付了他的一等舱船票的票款。根据日记，前往美国的“伽力克号”实际的开行日期是5月16日。该船于6月11日抵达旧金山。13日，容闳花了78.89元购买到哈特福德的火车票，14日到达洛杉矶，次日与他的大儿子容颢彤（Morrison）会面。17日颢彤与他一起登上东行的列车，但次日父子二人又分别。他在6月21日早晨7点，抵达哈特福德。次日他又到纽黑文，与他的次子颢槐（Bartlett）相会。这些细节，在日记中记录得很清楚。

这一年的日记记录了容闳交友的情形。他和家人、亲戚关系很密切，特别是与他两个儿子以及他的其他亲属通信和见面都很频繁，其中包括容星桥、容逸卿、阿春等。日记记录了他回美国后与各地朋友的接触、通信，显示他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交往面。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容闳生活的宝贵资料。

容闳日记中提到的知名人物也有不少。他和这些人物的交往记录，可为研究近代史事提供史料。如2月14日的日记提到后来清华学堂的创办者唐国安的来访。1902年，容闳居住在他的家乡附近，正是他与革命党人、维新党人都有比较密切联系的时候，而他回美国后，也与中国的维新、革命二派保持密切联系。研究者已经对他的活动进行过不少论述，但他的日记却很少透露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日记中也有一些简单的记录，可以显示他与各方面人物的联系。

“伽力克号”于5月24日抵达横滨，停留数日。26日日记载“与梁启超、冯镜如及他的弟弟冯紫珊共进午餐。他们提出给我一笔钱，让我在日本游览，我谢绝了。一点钟离开长崎。”^⑨显然，梁启超等是很想与容闳加强联系的。而容闳回美国后不久，也多次与梁启超通信。7月21日，容闳“收到一捆来自西部太平洋沿岸与不列颠哥伦比亚中国维新会（保皇会）的中文信件”。^⑩保皇会中与容闳联系最多的是徐勤。容闳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徐勤是1902年3月6日，只有一句简单的“收到徐勤（Chu Khan）一封信”。^⑪他回美国后，作为保皇会重要骨干的徐当时正在美东地区活动，积极与容闳联络。8月21日，容闳在日记中记录“给徐君勉（Chu Kwan Mien）寄信”。^⑫8月29日，徐勤到哈特福德看望容闳，晤谈甚久。^⑬

从容闳拒绝梁启超等人资助游览日本一事来看，他希望与康梁一派人士保持距离。8月31日，徐勤到访后两天，容闳写道“拒绝参加帮助保皇运动的工作”。^⑭这句简短的话，很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不过，此后保皇会还经常通过书信、电报与容闳联系。如10月18日，容闳又收到保皇会问候他健康状况的电报。显然，该会密切地观察容闳的动向，并希望维持与他的联系。^⑮徐勤与容闳之间的联系则更为频繁。史实表明，在此后的数年中，容闳与梁启超、徐勤乃至康有为等保皇会人物，都有不少交往，上述日记中的话，也可能是一时情绪的表露。

不过，容闳在1902年后与革命党人的关系的确越来越密切。是年9月17日，容闳收到了谢缙泰8月13日从香港寄给他的挂号信。两天后容闳即给他回信。^⑯11月17日，谢缙泰再次给他

寄了一封挂号信，内附一个密码本。20日，容闳也给谢氏寄了一封挂号信。^⑤他们之间这种郑重其事的通信，特别是密码本的出现，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谢氏在《中国革命秘史》中所言他与容闳之间策划革命行动之记载，是具有相当真实性的。容闳没有记录与谢氏往来书信的内容，正如他也未记录与梁启超等往来书信的内容，都是令人遗憾的事。

容闳日记还透露，他在美国还进行了其他试图帮助中国的事务。如10月24日的日记“写信给托马斯·丹尼(Thomas Denny)，约定与他见面，商谈为在中国实施初等教育筹集款项之事。”^⑥而日记正文之后所附中国中央政府发行国债计划，也说明他在关心并筹划中国各方面的事务。

以上所说的日记内容，只能提供一些研究容闳生活及他与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关系的线索，而无法从中了解更丰富的内容。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只有这一本1902年日记存世，希望其他时间的容闳日记以后也能重现于世。^⑦

从前述容闳的函件中，我们还可以获取其他的历史信息，如他谈到了耶鲁授予他的荣誉；^⑧谈到与他一起到美国留学、但较早回国的黄胜；^⑨等等。容闳的日记本也还有一些其他有意思的资料。如其中夹了一封他的侄子容逸卿在是年初写给他的中文信，主要内容是财务问题；一个帝汶物产的单子；两张印度与中国的财政收入对照表；一份英文“在中国发行政府公债计划”共10点。相信这些资料，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容闳这个历史人物，也有助于我们对近代史上相关史事的研究。

作者附记：以上有关容闳文献的论述，主要以耶鲁大学图书馆整理的容闳档案和康涅狄格州图书馆所藏的容闳日记为基础。鉴于多年来容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较为缺乏的状况，这些史料可谓弥足珍贵。笔者与学生近日已将这些资料整理、译校完毕，年内应可付梓。但据我了解，存世的容闳文献并不止此。去年下半年，笔者有机会赴美访问，在耶鲁大学翻阅各种档案，从中觅得容闳手稿多件，也收集到的与容闳相关的其他文献，可谓所获颇丰；最近又经友人帮助，从其他途径寻得容闳文献多件。故本文所论，仅为未刊容闳文献之一部分。对新近所获容闳文献之整理与研究，当俟诸异日。特此说明。

①见 Edmund H. Worthy,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XIV, pp. 265 - 287.

②见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载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广东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该书另有1999年版）；章开沅《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耶鲁馆藏容闳档案简介》，杭州《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③如袁鸿林《容闳述论》，北京《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按：该文也引述了耶鲁所藏容闳函件。日本亚细亚大学容应萸教授曾向我提供1902年容闳日记的部分照片，谨致谢意。

④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第

281~283页。

⑤⑥⑦⑧⑨Yung Wing to S. W. Williams, April 15, 1849.

据《南屏村容氏族谱》(1925年纽约版)，容名彰为容闳三叔。其兄名容光杰，号穗邨。

⑧容闳早年在孟松学校时期入教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他到耶鲁读书后，加入了学校的公理教会。1877年，他写信给与教会相关的人士，确认他“与大学教堂的关系未有变更”，并表示“由于我经常变更住处，如果教会不反对的话，我希望与教会保持关系直到安息之时。”(Yung Wing to Franklin B. Dexter, Oct. 8, 1877.)但他后来又改变了想法。1887年，他又写信给耶鲁校长德怀特说“我希望将我在耶鲁公理教会的会籍转至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庇护山(Asylum

Hill) 公理教会, 如果显示我在孟松公理教会会籍的记录已按时准备好的话。” (Yung Wing to T. Dwight, Dec. 2, 1887) 原因大概是他已经选择哈特福德作为永久定居之地。

⑩⑪⑫⑬⑭⑮ Yung Wing to S. W. Williams, Dec. 25, 1850.

⑯⑰⑱ Yung Wing to S. W. Williams, Dec. 30, 1852.

⑲⑳ Yung Wing to S. W. Williams, July 27, 1853.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 Yung Wing to Prof. Noah Porter, Feb. 17, 1872.

㉙㉚㉛㉜㉝ 容闳 《西学东渐记》, 恽铁樵、徐凤石译, 广东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年, 第115、116、134、26、98页。

㉞ Yung Wing to S. W. Williams, Feb. 19, 1877.

㉟ [美] 卫斐列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顾钧等译, 广西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291页。

㊱ Yung Wing to S. W. William, Feb. 21, 1877.

㊲ 有关情况见卫斐列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第291~293页。

㊳ Yung Wing to S. W. Williams, Feb. 21, 1877.

㊴㊵ Yung Wing to S. W. Williams, June 7, 1877.

㊶㊷ Yung Wing to S. W. Williams, Aug. 23, 1878.

㊸ Yung Wing to Addison Van Name, February 26th, 1877; March 1st 1877; May 4th, 1878; May 9th, 1878.

㊹ Yung Wing to Addison Van Name, March 1, 1877.

㊺ Yung Wing to Addison Van Name, March 1, 1877.

1910年, 他的自传出版后, 也送了一份给耶鲁图书馆, “作为我爱耶鲁的一点小意思”。(Yung Wing to J. C. Scharb, Dec. 13, 1910)

㊻ Yung Wing to Addison Van Name, March 26, 1879.

㊼㊽ Yung Wing to T. H. Gallaudet, June 2, 1848.

㊾ 盖劳德特家族的简况如下: 托马斯·盖劳德特生于费城, 其父曾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秘书。托马斯·盖劳德特是北美第一所聋人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其子爱德华·盖劳德特继承了他的事业, 并于1864年在聋人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第一所聋人学院, 该学院于1986年成为盖劳德特大学 (Gallaudet University)。托马斯的另一个儿子也叫托马斯·盖劳德特, 是圣公会的牧师, 也为聋人教育做出过贡献。容闳文献中还保存了一封容闳写给爱德华的妻子的信,

感谢她邀请他的两个儿子参加以此聚会。见 Yung Wing to Mrs. Gallaudet, January 1, 1889.

㊿ 如他在1877年的一封信中还提到鲍留云等传教士的情况, 见 Yung Wing to S. W. William, June 7, 1877.

①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 Yale College, Henry Baldwin.

②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 Yale College, Charles Barrett.

③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 Yale College, L. M. Gibson.

④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 Yale College, James T. Batiherus.

⑤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 Yale College, William Kautchisow.

⑥⑦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 Yale College, T. W. Cattin.

⑧ Selected Autographs to Yung Wing by His Classmates of 1854, Yale College, Henry L. Hubbell.

⑨ 章开沅 《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 吴文莱主编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 第287~288页。

⑩ Diary of Yung Wing, May 8, 1902.

⑪ Diary of Yung Wing, May 24, 1902.

⑫ Diary of Yung Wing, July 21, 1902.

⑬ Diary of Yung Wing, March 6, 1902.

⑭ Diary of Yung Wing, Aug. 21, 1902.

⑮ Diary of Yung Wing, Aug. 29, 1902.

⑯ Diary of Yung Wing, Aug 31, 1902.

⑰ Diary of Yung Wing, Oct. 18, 1902.

⑱ Diary of Yung Wing, Sept. 17, 19, Dec. 19, 1902.

⑲ Diary of Yung Wing, Nov. 17, 20, 1902.

㉑ Diary of Yung Wing, Oct. 24, 1902.

㉒ 容闳1902年11月29日日记 “到镇上购买1903年的日记本”, 花费1.65元。可见, 1902年后容闳继续写日记。

㉓ Yung Wing to Franklin B. Dexter, Oct. 4, 1876.

作者简介: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陈子先]